

第一章 江西走向近代的内外环境

第一节 江西走向近代的国际环境

一、扩张与开放的世界

中世纪后期，欧亚大陆的三个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强大的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急剧向下滑坡；而另一方面，落后的欧亚大陆西端的基督教世界经过一场空前的大变革而崛起。崛起之后西方迅速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并积极地向海外开拓商品市场，展开大规模的殖民活动。

15—16 世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首先在海上崭露头角，耀武扬威，显赫一时。他们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道，成功地进行了环球航行。接着，又野心勃勃地在大西洋划定了世界第一条分界线，并在各自认为拥有的半个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地。他们足迹遍及三大洋，殖民地遍布五大洲。

到了 16 世纪中叶，尼德兰发生欧洲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成立了尼德兰共和国，利用其西朝英国和大西洋的优良港湾，又背靠巨大的法国内地的优越地理位置，尼德兰很快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但是尼德兰毕竟国度太小，资源不足，经过 17 世纪与英、法两次交战，元气耗尽，进入 18 世纪以后，就不得不把殖民优势地位让给英国和法国。

英、法等国在 18—19 世纪疯狂进行侵略扩张活动，这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英国于 1644 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688 年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17 世纪中叶开始，产业革命在英国兴起，并迅速波及整个西欧国家。产业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期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以英国为例，到 1835 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 1953 台，纱锭 900 万枚，年产生铁 102 万吨，煤 3000 万吨。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生产的社會性与占有制私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剩余商品日渐增多，国内市场越来越显得狭小。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十分强烈的机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疯狂地对外侵略扩张，以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以适应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漩涡之中它就不能生存和发展。”

18 世纪的最大的国际事件，就是英法两国在美洲、亚洲、非洲争夺殖民地霸权的斗争，英国凭借着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以及相对于法国的海军比较优势，最终战胜法国，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殖民体系，同时法、德、意、美等国也在各地纷纷争夺殖民地。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发展以极其严重的影响，它使西欧国家控制了外洋航线，征服了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广阔地区并向那里大量移民，从而改变了世界各民族传统的地区分布。通过扩张，西欧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加快，财富迅速增加，实力强大，到 19 世纪中叶，它们已能渗入并控制中东、印度和中国这些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世界的一个小地区控制了其余的大地区，这是人类发

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随着殖民扩张活动的开展，西方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相互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逐渐成为一个整体。

二、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及亚洲各国的命运

17 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便开始侵略亚洲，此后其对亚洲的殖民侵略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从 17 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亚洲，一直到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产业革命，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重大发展之前，西方国家对亚洲的殖民扩张都带有原始资本积累性质。它们主要采用海盗式袭击、殖民战争、欺诈性贸易、赤裸裸地掠夺亚洲人民的财富，再把这些财富运回宗主国，变成扩大再生产的资本。

第二阶段是自由贸易阶段。从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延伸到 19 世纪末，随着产业革命的继续发展，工业资本家登上政治舞台，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需要进口廉价原料以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打开世界各地市场以扩大商品销路，于是自由贸易便成了它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一阶段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重点已从美洲移到了亚洲，它们对亚洲各国实行廉价商品的倾销和原料掠夺，如果遇到抵抗就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迫使对方接受不平等条约，以实行其既定的国策。这种侵略触动了亚洲许多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给亚洲各国原有的封建制度带来了严重危机，直接启动了亚洲各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阶段。从 19 世纪末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亚洲的侵略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除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之外，又开始进行资本输出。在这一

阶段中，帝国主义各国争夺向亚洲国家投资的机会，控制亚洲国家的经济命脉，对亚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实行分割和重新分割。

在遭受西方国家侵略的过程中，亚洲各国近代的命运各有自己的特点。印度、印度西尼亚等国，早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就已经被英、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贸易公司蚕食鲸吞，完全沦为英、荷等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16—17 世纪曾盛极一时，但到了 18 世纪后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特权条约制度”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逐步地合法地控制了这两个帝国。中国、日本、朝鲜是另外一类，在鸦片战争之前，这三个国家都没有沦为殖民地，也没有签订“特权条约”，国门始终没有被打破。

第二节 江西走向近代的国内背景

一、作茧自缚的闭关政策

清初，中国的国门之所以没有被西方列强打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政府实行了“闭关自守”的政策。

清顺治十三年清政府开始严行海禁，不准任何船只出海。乾隆二十二年下令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封闭江、浙、闽三关，只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同时采取一系列限制中外贸易的措施，如提高关税、外商买卖必须通过十三行进行、外国商人不准在广州过冬等等。

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既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也有其文化背景。

从经济上来看，封建的地主制经济的长期统治，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是清王朝推行闭关

锁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不是说这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如西方，事实是，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不比西方差，当时中国可供出口的货物品种繁多，货源充足，特别是丝、茶、瓷等在国际上有广阔的销售市场，潜藏着巨大的竞争能力。这里讲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商品经济不发达主要是指当时中国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强大的资产阶级。因此，当代表地主政治利益的国家实行闭关锁国时，就不会遇到内部强大力量的反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政府推行闭关政策是有其经济基础的。此外，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又为这种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前提条件。这种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使封建统治阶段所需之物品，完全可以在国内解决。中国的这种经济特征，使统治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实行闭关政策。

从政治根源看，当时清王朝之所以要执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并非担心立即有外国军事入侵的可能，而主要是针对国内的骚动和反抗，害怕人民和外国人频繁接触，不是带来中外之间无休止的纠纷，就是中外结合形成强大的反清力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清政府闭关政策才渐趋严格。乾隆皇帝就曾认为，外国人是很可怕的，与洋人来往密切的中国人以及归国华侨都是奸徒，只有把这些不安定因素清除干净，王朝统治的基础才能稳固，因此，乾隆及其之后各朝，随着清廷防范中外交往的措施一个个出台，闭关锁国政策也就愈来愈严厉了。

从文化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有它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儒家封建思想把人分为“士、农、工、商”，视商人为“小人”，并使之僵化为一成不变的传统。它要求人们按“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进行修养，以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它以禁锢思想的八股取士的方法，引诱有作为有能力的人走上尊孔读经的仕途，它把中国看作天下的中心，孤芳自赏，安抚“四夷”，严重缺乏外向开拓精神。总之中国传

统文化具有不好战，不尚侵略的中庸之道的特点。公元 1582—1610 年间居住在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为此十分惊异，他说：尽管中国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海外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只热衷于中国国内的争权夺利，他说中国人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爱征服别国。在这方面，中国人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于他人所享有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特点，只能说明中国没有扩张的根源，容易产生自我隔离的机制，它可以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但要令其在较短时间内向近代文明转轨，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必然显示出巨大的惰性，当世界近代文明潮流滚滚而来之时，中国文化企图设置一道道防波堤墙。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文化原因大致在此。

尽管闭关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某些维护国家主权的性质，但是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其对外国势力的阻挡是消极的。综观当时的形势，中国有两种社会转型的道路可供选择。一是，主动开放国门，积极主动地以和平方式移植西方近代化因子而实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就是走这一条路。二是，起而闭关自守，继而被动抵抗西方国家的暴力和征服，最后，不得不被动地开放国门，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乃至政治、经济制度，不自觉地被别人拖入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之中，中国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走这一条路，使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使中国丧失了许多顺利实现近代社会转型的条件。统治者执行闭关政策的结果必然是作茧自缚、闭目塞听，它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借以取长补短，赶上世界发展潮流。环视 19 世纪以前中国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应该主动开启

国门，通过与西方的交流，加强应变能力，提前创造实现社会转轨的有利时机，由于清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使这个有利时机白白地丧失了。在世界朝着开放、一体化发展的潮流前面，中国门户迟早要被敲开，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动开放，主动开放，前途光明；被动开放，灾难深重。

二、走向近代之际中国的衰落

18 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但是，如果将这些成就放在 18 世纪世界文明之中和欧美的主要国家加以横向比较，那就会呈现出另一幅黯然失色的图景。18 世纪的西方国家基于自己的历史传统，已经走出了中世纪，这些国家经过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科学的发展，直驶资本主义时代。而 18 世纪的中国还远未走完封建社会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尤其是在乾隆年间以后中国已经表现得明显的衰落。

经济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使用几千年前老祖宗留下来的农具进行生产，生产力没有提高的迹象。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甚至出现过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育先天不足，后天不良，发展得非常缓慢，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依然犹如沧海一粟。当时封建土地集中现象十分严重，大多数土地集中在官僚地主手中，由于地少人多，地租剥削率十分严重，人民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清朝的政治，当时已经朽腐不堪。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大都昏庸无能。当时有人说：清朝大小官吏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结党营私之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整个官场一片黑暗，贿赂成风。权臣和珅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和珅在乾隆朝为官 20 年，非法所得共计 8 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 8 年财

政收入总和。当时民间流行的一句俗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当时吏治败坏的生动写照。从皇帝到知县，封建政治体制超常稳定，整个政治领域，看不到任何民主政治的迹象。

从军事上看，当时清王朝拥有 22 万八旗兵和 66 万绿营兵，但不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已腐败不堪，战斗力十分衰弱。从武器装备情况看，清军主要是刀、矛、弓箭等冷武器，火绳枪、滑膛枪等老式火器都非常少，再有就是一些笨重的铸铜炮和铁炮，水师所用的战船，不过是用薄板旧钉制成。问题不在于武器落后，关键还在于清军连这些落后的武器的使用方法也不熟悉，甚至根本不知道。从军事的管理和训练情况看，由于承平日久，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兵都缺乏必要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平日里三五成群，吃喝嫖赌，且大多数是“双枪兵”，吸食鸦片。军官们不理军务，只知克扣军饷，花天酒地，这样的军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派到中国作战的兵力一开始只有 6000 人，最多时也才 1.5 万人，而清政府前后派出了 80 万所谓的精兵良将，结果英国势如破竹，清军一路惨败。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一方面极力提倡程朱理学，鼓吹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以八股取士，笼络知识分子，禁锢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其凶残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乾隆时诗人沈德潜曾写咏花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被认为是讽刺清朝的异族统治，结果遭剖棺戮尸；胡中藻有一句诗说“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凌迟处死。这种文化高压政策造成了思想文化的沉寂局面，知识分子普遍感觉到非常压抑，正如龚自珍己亥杂诗里所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国走向近代之际的这种衰落，注定了近代中国整个社会转

型的“后发外生”的类型。它决定中国近代社会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近代性因素不断成熟和积累的结果，而是对外部近代化因素挑战的一种回应。这种情况，对江西这样省份的近代社会转型，不可能不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江西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江西近代社会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而使江西的近代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有“后发外生”型特点。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江西近代社会的转型，既是古老历史传统在新时代的骤然断裂和近代化因素的被动嫁接，又是以往历史传统在近代静悄悄的绵延，社会转型具有传统与近代互相交错，社会转型不顺畅、不彻底的显著特点。

三、沉沦与变革的近代中国

1840—1949 年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沉沦”与“变革”。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掠取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除割地、赔款之外，还允许外国在中国投资办工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化程度大大加深。20 世纪初，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再一次打败清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至此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侵略者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发动了长达 8 年的侵华战争，大片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关头。整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社会沉沦史。

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没有能完全阻止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在与帝国主义抗争的过程中，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中国孤立于世之外的格局被打破，封闭型的中国封建社会被迫开始了痛苦的近代社会转型过程。在中国融合于世界的过程中，封建的自

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传统的政治正在缓慢地向近代政治过渡，新的近代思想文化教育在兴起，在发展，整个社会处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当“天朝大国”的美梦被西方船坚炮利撞得粉碎之时，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为了应付这个“千古来有之奇变”，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这一主张后来获得了洋务派官僚的共识，他们把林魏的主张付诸实践，引进西方先进设备、技术兴办近代军民企业，开始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此后的 30 多年中，中国出现了新式企业、近代海军海防和近代教育、科技事业，翻译西方书报和派遣留学生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进行的。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改革，它引进了大机器生产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兴起，为中国的近代化开了先河。“自强新政”的不断深入，还促进了社会思潮的转变和新价值观的产生，并孕育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但是，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试图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嫁接到中国传统体制之上，从而注定了它的失败命运。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北洋舰队在战争中的全军覆灭，宣告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求富求强”的目的。于是朝野上下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共识：要战胜西方列强，仅仅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路矿工厂”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思想文化意识。再加上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自 19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维新思潮，迅速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于 1898 年掀起了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在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下，戊戌变法失败了，其社会改革成果只剩下京师大学堂，然而可喜的是，在内外形势

的逼迫之下，曾经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变法新政。新政所涉及的内容远比“百日维新”广泛，是清政府推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运动。在这场改革运动中，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废除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从而除去了传统体制的一个重要支柱，使新式教育在全国逐渐得到推广，新的教育体系得以确立，留学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这不仅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使传统体制遭到了进一步瓦解，而且也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其次是编练新军，促进了军队的近代化。而且由于清末编练新军的权力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地方分权主义趋势由此得到加强，封建专制政体出现重大松动。新政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宣布“预备立宪”，改革传统的政治体制，全国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立宪运动。虽然立宪政体最终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但立宪运动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承认，使传统社会体制将进一步走向分裂。清末新政使政府组织具有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它促进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自洋务运动到晚清新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但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任务——救亡图存和强国富民，清政府一项也没完成。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的中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国力更加孱弱，这样清政府的合法性自然会受到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推动近代化的途径，终于由改革转向了革命。

1911 年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国 260 多年的满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国社会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它带来的政治民主化趋向，兴办工商业高潮，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独立运动，都使近代中国加快了近代化的进程。但是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具有天生的软弱性、妥协性，正是这一点导致了辛亥革命本身以及后来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的失败。革命

历史一再向人们证明：资本主义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完成不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两大任务。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并在中共二大会议上破天荒的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是继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飞跃，它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一场巨大的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从而开辟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第三节 江西走向近代的内部环境

一、封闭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作为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因素，时刻影响着人类的活动，生产的地理大分工，社会经济结构的构成，以及民情风俗的变化等等无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处北纬 $24^{\circ}24'$ — $30^{\circ}04'$ ，东经 $113^{\circ}34'$ — $118^{\circ}29'$ 之间，东邻浙江、福建，南通广东，西接湖南，北毗湖北、安徽，与东南沿海各港口或江北重镇的直线距离，多在 600—700 公里之间，刚好位于中国浅内陆这个地理位置上。

江西是江南丘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形分布有着明显的规律：边缘群山环绕，内侧丘陵广亘，中北部平原辽阔，整个地势，由外及里，从南而北，渐次向鄱阳湖倾斜，呈不规则的环状结构，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向北开口的大盆地，使江西地理环

境具有明显的封闭性。

江西的东北面是怀玉山，自赣浙皖三省边陲向西南倾斜，至余江县境内，长 150 公里，一般高度在 500 米以上，构成赣皖、赣浙交通阻隔。东南面是绵延起伏的武夷山，长 500 公里，山势雄伟，海拔在 1000—1500 米之间，构成赣闽屏障，在浙赣、鹰厦铁路通车以前，江西同浙江、福建的商品流通，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规模上都大受影响。南面更是绵延群山，南岭、大庾岭、九连山把广东与江西隔开，海拔多在 600—800 米，赫赫有名的赣南商道，就是在那些山坳，隘口向前延至广东。但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五口通商口岸的开辟，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从广州移至上海，使原来赣南商道的重要交通地位完全丧失，“向之冲途，今为迁道”，直接造成这一带经济的迅速衰退，以至近代赣南成为全国有名的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穷山区”。在江西的西面耸立着高峻险要的罗霄山脉，很多地方是像井冈山那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亦是近代土匪强盗出没之地，根本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商品和人员的交通。

至于江西北面开口，的确使近代九江的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一来九江不是江西的政治、经济中心，二则又地处江西的边缘，所以其对江西广大腹地的经济辐射能力并不强，对近代江西社会转型起不到很大的影响。

江西境内有赣、抚、信、修、饶五大河流，省内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但是江西的水系均发源于四周的群山，随地势由四周流向中间的鄱阳湖，除了在北面的湖口能与长江连接外，江西所有的河道都是在境内打圈，没有一条河流能使江西与外界相通，所以从水陆形势看江西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特点。

江西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宜农性”。江西的中北部和五大河下游是一片地势平坦，河流交错的鄱阳湖平原，其范围北起长江，南到新干、临川，东抵贵溪，西至新余、

上高，地跨 25 个市县，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在平原的外侧，是平缓的红色丘岗，近代以前就已开辟为旱地和水田。平原内侧是海拔 50 米以下的滨湖圩区，整个鄱阳湖地带，河湖密布，阡陌纵横，草洲滩地连片，池沼稻田相间，土壤肥美，气候四季分明，温暖湿润，日照充分，雨量丰沛，自秦汉以来就有中国“鱼米之乡”的美称。

江西入近之际这种自然环境，对江西近代社会的转型不能不产生严重的影响。

首先，封闭的自然环境，使江西在入近以后，交通阻隔，运输不便，地处内陆，信息不灵，它割裂了江西同外界的联系，使江西永远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阶段，带来的后遗症是不愿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保护了落后，培养了懒惰，严重束缚了江西近代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其次，江西自然环境的“宜农性”，使江西进入近代以后，在全国生产的地理大分工的格局中，不自觉地被规定为传统的农业区域。由于江西适宜于粮食生产，发展农业，所以到了近代，江西同沿海省份的生产地理分工基本上趋于固定：江西成为东南各省乃至全国的粮食产区，沿海省份成了发展近代工商业的主角，相反江西只能依然故我地搞传统农业。

其三，传统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超稳固的行为模式，即人们长期以来使用同一种生产工具，完成同一类生产工序，每天过着同样的慢节奏的生活。再加上江西土肥水美，旱涝保收，生存压力不大，这种环境，严重削弱了江西人的奋斗拼搏意识，宁愿守着土地过清苦的生活，缺乏一种外向的精神，固本守己。这就使江西近代社会转型具有明显的“慢节奏”特征。

最后，自然环境的封闭，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发达，这些因素交错在一起，导致了近代江西文化落后。这突出地表现在近代江西对西方先进文化拒绝和地方

政府的思想、政策保守等方面，江西近代的社会转型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二、沉重的历史包袱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古代江西繁荣发达的封建经济。

秦始皇三十三年，为降服南方越人，秦始皇派尉屠睢发率兵 55 万南进江西，在此过程中，几十万北方军民驻留江西，与土著居民一起开发江西。到南北朝时期，江西已成为重要的粮食基地，当时京城之外的大官仓 $\frac{2}{3}$ 设在江西。西汉时期，江西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豫章郡的人口，由公元 2 年 35196 人，猛增到公元 140 年的 1668906 人，豫章郡人口数量在全国各郡中的排名，由第 53 位跃居第 4 位。唐宋之际，江西经济崭露头角，特别是从唐代后期开始，江西经济已跻入全国前列。据史书记载，宋代每年从东南六路漕运粮食 600 万石，江西在北宋时期输纳漕粮 120 余万石，南宋时为 200 万石，分别占东南六路漕粮总数的 $\frac{1}{5}$ 和 $\frac{1}{3}$ 。南宋时江西茶叶产量居全国第一，年产茶叶 460 多万斤，茶税占全国 $\frac{1}{4}$ 强，制瓷、冶金、铸钱、造船等手工业亦名列前茅。当时景德镇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其产品青白瓷畅销海内外，德兴铅山场铜矿为北宋三大铅矿之一，洪州、吉州、虔州等地造船业饮誉全国，有“舟船之利，尽在江西”之称。宋朝崇宁元年（1102 年），江西地区的户口已达 445 万人，这时的江西，实际上是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

进入明清，江西经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明洪武二十五年、弘治十五年 and 万历六年，江西分别征米 258.5 万石、257.8 万石、252.8 万石分别为全国的第一、第二、第二位。此时江西经济发展出现了由中部平原地带向周边山区扩展的趋势。当时江西各地山区被以客家为主体的移民大力开拓，种植茶叶、蓝靛、竹木、烟叶、苎麻等经济作物，由此又普遍发展起夏布、

造纸等手工业，它们都必须以交换和贸易为条件，来换取生活资料。尽管其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但毕竟已与传统的自然经济有了显著差别，形成了新的经济格局。在平原地区，则有市镇经济的显著发展。除了宋代即已兴起的景德镇外，在赣江水系上，又出现了临江、樟树、吴城和河口四大工商业市镇。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山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另一方面也与赣江这条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上大量的过境贸易直接相关。当时樟树有“烟火十万家”之称，还被人誉为“八省通衢”“天下雄镇”，不仅是全国第一药材码头，更是江南诸省货运集散中心之一。吴城则有“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的美誉，据调查吴城有各省商人会馆 48 所。据说清代广东商帮想建会馆，被当地势力阻挠，禁止他们动用本地一砖一瓦，广东商人于是在粤糖运赣的船中，每袋糖夹一砖一瓦，一、二年便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广东会馆。当年江西市镇商贸的繁荣，由这两个例子不难想见。

不仅如此，当时的江西商人号称“江右帮”，在全国的地位仅次于徽商和晋商，他们活跃在全国特别是长江流域各省直至云贵，乃至有“无赣不成市”的口碑。明代有个王士性在云南作官，发现云南江西抚州人“居什之五六”，甚至一直到缅甸，只要有村落之处，酋长头目无不是抚州人。清乾隆年间征缅甸，带路的华侨也多是江西人，可见江西人经商真是风气炽盛。另外，因为江西竹木贸易特别繁盛，江西遂川商人发明的木材体积价格的计量方法“龙泉码”，也成为全国商界公认的标准。

江西走向近代之际经济发展的这种历史积淀，既为江西近代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影响江西近代化顺利推进的一个历史的包袱。首先山区的过度开垦，造成生态破坏，使赣江泥沙慢慢淤积，通航能力下降。其二，由于历史上江西是上交中央赋税、漕粮的大省，使近代江西赋税负担特别苛重。第三，江西传统经济虽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毕竟是古典经济，在近代开

放的格局之下，在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的冲击面前，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最后，明清时期，江西经济的繁荣得益于广州为全国惟一对外通商口岸，以及运河—赣江—梅岭—广州商道的重要地位，然而，随着五口通商的开辟和近代交通的出现，赣商道的重要地位丧失，江西工商业经济发展顿成困境。

在江西自然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江西的封建文化也高度发达。江西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学校是汉代，汉代江西的私学是令世人瞩目的。那时江西人到长安求学者很多，回来办学的也不少，其杰出者如程曾、唐檀，去长安学习十数年，回乡办学，学生数百人。两晋时全国的学校不景气，但江西却很不一样。东晋豫章太守范宁兴学很有名气，他出私禄供给学生，学生达 1000 人，加之改革学制，他在豫章的成功办学吸引了很多学子。唐代天下的州县都建立了官学，江西也不例外，还有大量的私学以及一批书院。江西教育真正的高峰期是中唐后期到北宋中期，尤其是北宋时，官学昌盛，书院发达，培养了大批人才。南宋时江西已成了全国文化教育中心，书院教育异常发达，达 100 多所，是全国最多的也特别有名气。明代江西的经济文化仍然昌盛，仍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地区之一，主要体现在讲学风气很盛，一度成为全国的讲会中心。清代江西文化教育发展开始缓慢，而其他省发展较快，人才在全国的比重减低，朝廷重臣中江西人很少，政治影响力减弱。清代江西文化教育的衰退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江西清代人才还是居全国第七位的。其办学，在体制上，有民办、官办、官办民助、民办官助等多种形式。在教学方法上，提倡自学、自行研究、师生质疑问难，考试灵活多样，还允许不同学派争鸣。宋、元、明时期江西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南宋朱陆理学是全国执牛耳者，元代吴澄开理学风气之先。明中期以后，王守仁在江西边打仗边讲学，有一大批弟子，形成“江右王学”。此外，泰州学派的罗汝芳、颜钧等也是江西人。自汉至清